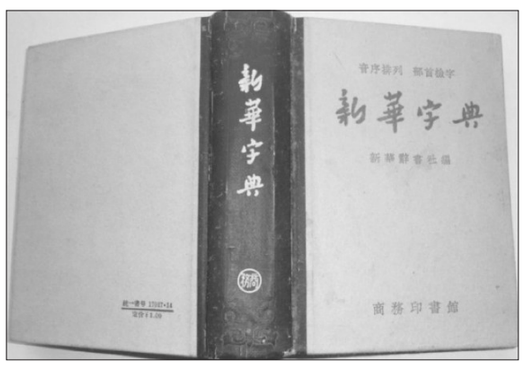
出版史 文化周刊

“文革”前商务版《新华字典》的三个版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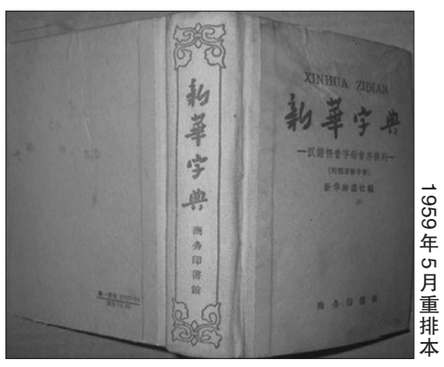
■王保贤

关于《新华字典》，笔者以前写过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老三版”，也写过商务印书馆的两个“新四版”（先后刊于《中华读书报》2015年2月4日和3月11日的“出版史版”）。今年是商务印书馆成立120周年，也是《新华字典》1957年“新1版”问世60周年，借此机会，再说说“文革”前商务馆出版的三个版本，即“新1版”至“新3版”。

1955年后半年开始至1957年夏，《新华字典》又进行了一次全面修订。修订后的本子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文革”前，商务共出过四版《新华字典》；但公开发行的，只有前三版。



1957年6月新1版



1959年5月重排本

1957年6月·“商务新1版”

《新华字典》在商务出的第1个版本，版权页作“1953年10月人民教育出版社初版，1957年6月商务新1版”——这一表述，既是对人教社的尊重，也是在执行政府有关出版物的规章制度——1954年4月出版总署发布的《关于图书版本记录的规定》第14条是：“从其他出版者转移来的书籍，从第1版算起，称‘新1版’。印次、印数亦均重新算起。但一般应在版本记录中载明原出版者的名称，或由出版者另行说明。”说到这里，笔者多少有点遗憾的是，现在转社出版的图书种类不少，但很少再有出版社在版权页上作如此明确的记载了，即使同一出版社的再版书，读者经常看到的也都是“第1版”，好像新版书一样，这不是一种好风气，会给后人的出版史研究带来许多麻烦的。

还有一个问题，现在也许会有人问，《新华字典》的发行量那么大，其利润非常可观，当时人教社为什么要把它转由商务出版呢？原来，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中期，人教社越来越偏重于编辑和出版中小学各科教材，已经很难腾出时间和精力，用于修订、出版字典的工作了；而与此同时，根据分工，出版工具书则成为商务印书馆的一项重要业务；至于利润，出版业尤其是出版普及性的字典，并不以追求经济效益为目的，当时又是计划经济，如果要说利润的话，大部分都是国家的。

“新1版”的出版背景是：1955年后半年，全国文字改革工作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化问题学术会议相继召开，文化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布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1956年初，国务院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文字改革委员会又发布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从一开始起，《新华字典》的编写和修订，其目的就是为了推广普通话和汉语规范化，因此，它一直是积极贯彻国家有关语言文字的各项规定的。这次修订，就是为了落实上述两会精神和实施有关法规而进行的。主持修订工作的，是萧家霖先生，他也是人教社“原版”《新华字典》的主要编者。

在推广简化字方面，这次修订过程中，整理了600多个异体字和繁体字——当时是把繁体字与异体字同样对待的，未对二者进行区分（《新华字典》明确把繁体字和异体字区分开来，始于1998年的修订本即第9版）——这样，“新1版”共收包括异体字和繁体字在内的单字8000多个，与此前人教社1954年8月的部首排列本相比，大约多出了700来个。在推广简化字的起初，一方面由于人们的习惯，另一方面也可能因为字模数量有限，“新1版”存在若干简繁并存的现象，比如字典正文中，有一个字头是“克兰姆”（即今天的重量单位“克”，当时字典中收有很多这样的“复音词”字头），但在《凡例》的举例中，却是“克蘭姆”。

“新1版”是音序本，其音序仍然是按照注音字母的顺序排列的，但又有一个特点，就是按音序排列的次序，给字典中的全部字头编列了号码，“互见”的地方注号码，不注页码。这样做有一个好处，就是在编稿子的同时，也就有了“互见”地方的号码，而不像注页码那样，必须等到排好版后才能填写。这种方法仅延续到1959年版中，以后就不再使用了。在注音方面，“新1版”采用了两种注音方式，一种是继续保留下来的注音字母注音（实际上一直保留至今），另一种是新的，就是按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第一式拼音字母注音，同时废弃了人教社部首排列本中的同音字注音（直音）和反切法注音。当时，汉语拼音方案还没有正式形成，按照方案（草案）的第一式拼音字母的注音方式，有些字的注音，同今天相同，但还有不少字的注音，同今天是有区别的，比如今天的“xing”音，当时作“hing”；今天的“qiao”音，当时作“kiau”，等等。

1957年11月1日，国务院公布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这是对1956年2月文字改革委员会发布的《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修正。1957年12月，“新1版”印行了第2次印本，这个印本的扉页上，多了个“1956年修订·1957年11月根据汉语拼音方案修正草案改定注音”的说明。通过比较可以发现，第2次印本中的注音，已经同今天的注音差别不大了。仅从这一变化来看，“新1版”的第2次印本，实际上已是一个新版，但由于当时的版本记录并没有改变版次，我们今天也只能延续这一版次认定了。

从1957年6月至1958年5月，“新1版”总共印行了5次。2007年1月，商务印书馆为庆祝成立110周年，以1958年5月的第5次印本为底本，影印了“新1版”，称《新华字典》的纪念“珍藏本”。

1959年5月的改排本

1958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了《汉语拼音方案》。根据这一方案，编者对字典的音序进行了改排，这就有了1959年的改排本（“改排”是扉页上的用语，版权页则作“1957年6月新1版，1959年5月修订重版”）。这在商务版《新华字典》的历史上，被称为第2版。

该版的最大特点，在于它是《新华字典》历史上，按照汉语拼音字母音序排列字头的第一个版本——此前人教社的“原版”和商务的“新1版”，这两个音序本正文开头的第一个字母都是“B”，从该版起，则改为“A”了。当时，普通话审音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该版仍然保留了诸如“lui”（泪）、“lüan”（娈）、“yai”（崖、睚）等音节。对于几个鼻音的叹词，仍然没有规定注音的方法，而使用了鼻音声母单独注音或用它跟别的声母拼合注音的方式。根据《凡例》第1条，在内容方面，该版并没有太多改动。

笔者经常看到，有人总喜欢指责《新华字典》，说它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总是在“跟风”，这似乎有些言过其实了。该版的修订工作是在“大跃进”中进行的，但我发现，“跃”和“进”的释文，并没有什么变化。比如“跃”字，人教社“原版”给出的释文是：“跳（跳跃）：新中国在飞跃进步。跃跃欲试。”从部首排列本开始一直到该版，除将“新中国在飞跃进步”改为“新中国在飞跃前进”外，再无任何修改——在后来1962年版、1965年版、1971年版（即“文革”版）的举例中，又只剩下了“飞跃前进”一词，连“新中国在”几个字和“跃跃欲试”这一成语都删去了——有读者也许不相信，但事实是，“大跃进”一词是在粉碎“四人帮”后出版的1979年版（第5版）中出现的。

1959年改排本共有7个印次，多是在1959年的后半年印刷的，最后一个印次是1960年1月的第12次印本。当时，国家的经济情况各方面的供应是比较紧张的，就我所见该版的几个印本来看，所用纸张都很粗糙，因此也就比其它版本要“厚重”一些。还有，这一版字典中，没有全书的总目录。

1962年7月·修订重排第3版

1962年7月，商务出版了《新华字典》的第3版，版权页作“1962年7月修订重排第3版”。根据该版《说明》（通常字典上的“凡例”，在这一版和后来的1965年修订重排本、1979年版、1987年版、1990年版、1992年版中，用“说明”代替了）的第1条，它是对1959年版“略加修订，重新排印的”，似乎变化不大，但根据刘庆隆先生（刘先生参加了人教社“原版”的编写，后又参与多版包括该版的修订工作）的说法，当时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字典中的一些释文和例句，已显得不是很合适了，因此，虽说是“重排”，但修改还是不少的；此外，还增加了少量字头。

主持这次修订工作的，是著名语言学家丁声树先生。当时丁先生的任务，主要是主持编纂《现代汉语词典》，因此，这次受命主持《新华字典》的修订，也就很自然地使得这本小字典在某些方面受到了《现汉》的影响。比如说，以前的《新华字典》没有收“匼”字（读 k ē），而当时丁先生正在研究这个字的读音，后来，这个字也就收入字典中了；还有关于“癌”字的读音，这个字本来读 yán，与“炎”同音，但丁先生在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后，主张将其注音从 yán 改为“ái（旧读 y á n）”。据了解，语言学界的同志认为，把“癌”字读作 ái，主要源自吴语，是不符合北方话的标准的，因此，单从音韵学、方言学角度看，给这个字注什么音，或许还值得进一步推敲，但如果考虑到医疗工作和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交际，注为 ái 却是最为恰当的。

关于丁先生严谨治学的事，我还看到过一则材料，是说在该版开印不久，他突然发现“垓”字的第一个义项为：“垓下，在现在安徽省，项羽死在这个地方。”他赶紧对修订人员说：“霸王垓下被围，乌江自刎，怎么会死在垓下呢？错了好些年了，这可是个大事故！”同时立即给商务打电话，请求“立即停印”，并让五分钟后等他的修改决定。大约一两分钟后，丁先生就把电话打过去了，方案是将原释义改为“项羽被围困的地方”。修改后的文字仍然是八个，是很容易作挖改处理的。为核对这则史料，我查对了1959年改排本的1960年1月北京第12次印本（即1959年版的最后一次印本）和1962年修订重排本的1962年7月北京第13次印本（即1962年版的第1次印本），的确如此。

从这一版开始，《新华字典》除在北京印刷外，不少地方也开始租型印刷了。就笔者所见，就有上海、重庆、长春、昆明等地的印本，其中又以上海印本的次数和印量居多。另外，也是从这一版开始，出现了平装本。平装本的定价是1元，比精装本少了两角五分钱，在当时，这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其实惠还是很明显的。

1962年底，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发布了《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初稿》的第三编，该编收异读词600条，并对以前发表的两个表中的某些地方作了一些修改。因此，最迟从1964年后的印本开始，在扉页和《总目录》之间，又增加了一个共4个页码的《修订表》。这样的印本，本来亦应视为新的版本，但同“新1版”的第2次印本不被当作新版一样，我们今天也只能尊重当年的版次认定了。

“文革”前商务出版的前三版《新华字典》，书名均用“鲁体字”，装帧设计风格一致，但在细节上，各版又都略有变化。

现代文学与晚清民国语文教育的互动

■王泉根

19世纪中叶以降至20世纪初，也即晚清民国时期，中国遭受西方文化猛烈冲击，内忧外患，病痛百出。革命、战争、救亡、图强，中国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变革、大转型的历史非常时期，前人曾将这一时期称之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引领大变局潮头的无疑是文化。晚清民国时期虽然社会动荡，风雨交加，但是思想文化空前活跃，各种错综复杂的学说、实践此落彼起，“体用”模式争论不休，由此促成了中国三千年以来的又一个“百家争鸣”时期。而文学与教育则是“百家争鸣”大变局文化潮流中最为精彩的两翼。

因为文学作为时代思想、心理、情绪与想象的晴雨表，总是担负着“启蒙”或“载道”的重要使命；而教育则直指着塑造未来民族精神与性格，谁争取到了教育的语话权，谁就赢得了未来一代，未来一代则联系着未来中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当我读到王林著《新文学的教育之路——论现代文学与晚清民国语文教育的互动关系》（台湾万卷楼图书公司2015年版）一书时，立时感觉到了王林发现问题的敏锐性与选题的价值。我认为，王林此著最重要的意义是提出了对新文学发生与“胜利”的新的解析维度与观点。

新文学，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现代文学，其发展壮大，自然有其思想的、文化的、社会的多重因素。但王林认为，还有一个更为直接与“功利”的因素，这就是教育，具体地说就是晚清民国期间的教育改制特别是语文教育的形态、结构与模式。因为，正是发生于20世纪初期的国语运动与文学革命这两大运动的合流所出现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主张，才把白话提升到正式书面语的地位，而国语运动又直接联系着中小学语文教育。新文学借助语文教育之力，语文教育成为新文学依靠的重要制度力量。正是通过这一“捷径”，新文学的新作品、新思维、新观念、新形态，才得以长驱直入，走进课堂、课本与“未来的阅读者”，而当一代代“未来的阅读者”成长起来以后，新文学自然而然地在中国扎下了深根，这是新文学之所以能在20世纪初叶很快“胜利”的重要原因。我认为，王林的这一论述是很有见地的，王林将现代文学与语文教育这两个学科之间“心有灵犀一点通”的节点，有机地联系了起来，而且做了精到的尽可能合乎历史事实的逻辑辨析，这种辨析又是建立在他所占有的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国教科书博物馆丰富的“国文”“国语”“语文”教材的基础之上。

王林的论述，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新文学是如何借助“知识—权力”机制进入语文教育领域，而语文教育又是如何反过来塑造新文学成为新经典的互动关系与过程，这种互动关系至少包含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语文教育的改革促进了文学革命的发生；二是新的语文教育制度帮助和建立了新的文学审美观和文学秩序；三是语文教学“经典化”了新文学作品，使之成为一代代的学生阅读和摹写的范式。通过教育之力推进新文学思想和新文学作品，一直是新文学主将——从胡适到朱自清们的重要文化策略。综观全书，王林这部专著的价值，显然不仅仅只是在研究视角的转换上，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通过现代文学与语文教育两者关系的考察，从而更加有说服力地描述和验证了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乃至“胜利”的过程与制度性保证，同时也更加有说服力地描述和验证了中国现代性语文教育范式形成的过程与复杂内涵。

说起中国现代语文教育与语文教科书，这无疑又是一个“说不清，理还乱”的话题。从20世纪初叶现代语文教育的逐步建立，到今天已经过去了百年，但语文教育与语文教科书依然还是在“改革”“争鸣”“探索”之中，甚至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焦点、难点之一。这是为什么？阅读王林的这部论著，我们似乎可以从中找到某些“释疑”的线索。

中国传统的语文教育是以“诵读”和“背诵”作为主要教学模式，所学“教材”则是以儒家学说作为主要“传道”内容的四书五经与古典文学。进入晚清，废科举，倡新学，受西方教育影响，新式学校与新式教材、教法应运而生，传统的教育内容与方法逐渐被新教学所取代。据资料：1904年初等小学设“中国文字”，高等小学与中学设“中国文学”；1907年统称为“国文”；以后又将小学课程改为“国语”，中学仍保留“国文”；1949年以后则改为“语文”。王林在对语文学科史料爬梳钩稽中发现：1904年清政府的《奏定学堂章程》所规定的高小与中学所设“中国文学”课程，讲授内容庞杂，包括“文义”“文法”和“中国古今文章流变”；文学则包含了“文学研究”、“文学教育”、“文章教育”“语法教育”等成分。“这一内涵界定的多义性，为后世关于语文教育性质的争论埋下伏笔，很多争论到最后都变成语文学科性质的讨论。”这是符合事实的。我在60年代初读初中时，曾见到过50年代的中学语文，分为《文学》与《语言》两种教材。进入新世纪的语文教改，一直在为语文学科到底是以“人文性”还是“工具性”为主争论不休，而语文课文的选文，则成了各种思想意识交锋的“引爆点”。“为什么鲁迅作品越来越少？”“为什么不见了《狼牙山五壮士》？”“为什么要选周杰伦的东西？”往往一篇文章的上或下，都会引起网络争吵，甚至成为这一年的“大事”。

语文教科书选什么不选什么，表面上看是教育界、出版界的事，而其背后则是各种意识形态与利益集团的博弈。从王林的这部论著中我们可以看到，从晚清至民国时期，不同利益群体都在争夺教科书的编选权、出版权，而编者与出版者又带有不同的文化身份、政治态度与利益目标，语文教育往往成为各种意识形态的角逐场。因而一部中国版的“国文/国语/语文”教材的编写史、出版史，就成了中国社会不同的意识形态和利益集团的关系史、博弈史。以此观之，今日语文教育与语文教科书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探索、争鸣”，也就不足为奇了。看来，“语文问题”还会继续存在。

阅读王林此著，对于我们如何理解语文教育与语文教科书，如何理解语文教育与文学、文化、政治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别有意味的参照系。从语文学科的种种“变化”与“改革”，可以看出“知识—权力”机制的运用轨迹，正如阿普尔（M. APPLe）在《意识形态与课程》一书所说：教科书“不‘仅仅’是一个教育问题，而且从本质上说也是一个意识形态和政治问题”，“因为它往往决定了‘谁的知识最有价值’”。

从王林的求学经历与职场经验看，他的知识结构是复合型的，近些年来，他除了从事语文教育的出版与研究外，还是一位著名的阅读推广人。但从本质上讲，王林始终将自己的学术坐标定位在儿童文学。因而他在现代文学、语文教育、阅读推广方面，始终不忘将儿童文学植入其中，同时调动儿童文学这种“人类优质文学”的价值资源、审美资源与艺术资源，来丰富与滋润现代文学与语文教育。这是他的特点与优势，也是他的这部论著的别开生面之处。王林始终将成人文学与儿童文学联系起来进行“新文学的教育之路”的探索与考察。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或者一部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如果缺失了儿童文学，那是不可想象的，“如同教育系统是小学、中学和大学上下连贯的一样，文学系统也应该是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上下连贯，否则很多文学现象就得不到完整的解释。”

我一直倡导同时也要求自己，学术论文一定要有“问题意识”。问题就是发现，就是创新，就是意义。最好的论著总是提出问题、发现问题、论析问题，自圆其说地解决问题的过程。王林的这部以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的论著，在我看来，正是具有这种“问题意识”学术品格的好书，这部别开生面的跨学科专著，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儿童文学、语文教育、小学教育史、出版史的研究，都是很有意义的。